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总体概况	(15)
一、游牧中的人地关系	(15)
二、营地划分与游牧社会	(27)
第二章 传统时代的草原	(50)
一、蒙疆中部	(50)
二、呼伦贝尔	(73)
第三章 游牧生态的个案分析	(85)
一、内蒙中部	(85)
二、呼伦贝尔.....	(101)
三、东蒙的定居游牧.....	(129)
第四章 畜群与人群.....	(150)
一、畜群结构.....	(150)
二、畜群与社会.....	(167)
三、游牧群体及其生态基础.....	(183)
第五章 雪灾与社会.....	(203)
一、风雪中的畜群与移牧.....	(204)
二、保畜与制度.....	(216)
第六章 农业渗透与半农半牧.....	(239)
一、农业渗透与游牧业的变化.....	(240)
二、定居与蒙人农牧业.....	(260)

三、半农半牧与生态文化类型.....	(275)
第七章 农业扩张与制度变迁.....	(294)
一、近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	(294)
二、交错的制度结构.....	(315)
三、生态与政治.....	(330)
第八章 土地关系与社会形成.....	(345)
一、清代蒙地的分割占有与蒙汉关系.....	(345)
二、河套水利与社会结构.....	(370)
第九章 人、物流与蒙古社会	(392)
一、犂青与社会流动.....	(392)
二、草原物流.....	(423)
主要参考文献.....	(451)
1. 中文文献	(451)
2. 英文文献	(458)
3. 日文文献	(460)
后记.....	(469)

绪 论

蒙古的历史是游牧的历史,研究游牧史是理解蒙古社会的一把钥匙,蒙古的历史也是经常与农业民族打交道的历史,所以,研究蒙古草原上的农业也是理解蒙古社会变化的钥匙。蒙古社会的传统,大多直接与草原、畜群和农业相关。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农牧业生态问题。研究传统时代的游牧生态,对解读传统蒙古社会极其重要。

本书所指的传统时代,主要是指传统游牧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存在的时代,由于史料的关系,其内容只在近现代才相对完全的揭示出来,所以本书的时段主要限于近代以来蒙古高原上传统农业与游牧业的内容。由于一部分传统生活方式一直到1980年代左右才被揭示出来,所以,本书的时间概念相对宽泛。

前沿领域

农业、游牧业与游牧社会的关系早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西方学术界对世界各地游牧业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绩斐然。除了对草原和畜牧业的科学研究之外,最近几十年来,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成就特别大。早在1940年,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在其人类学的力作《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The Nuer: A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中,就对非洲草原部落的游牧生态作过详细的研究。1960年代以来,生态人类学

兴起,学者们试着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草原社会,其中重要的一份成果是剑桥出版社组织专家编写的论文集《游牧生产与社会》(*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此书堪称游牧社会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中包括瓦尔特·哥特斯密特(Walter Glodschmidt)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顶尖人物。此书既有游牧类型学分析,又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阶级分析,也有氏族结构研究。另一部有关游牧生态的论文集是维斯兰德(Wolfgang Weissleder)主编的《游牧策略:非洲、亚洲沙漠区与欧亚草原游牧的交互影响方式与模式》(*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des and Models of Interaction in the Africa—Asian Deserts and Steppes*)。此书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对中东、非洲和亚洲草原上的各种游牧与文化的关系做了分析,其中对游牧族群结构和亲属关系的研究尤为出色。

人类学领域关于游牧生态与社会研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和非洲,史密斯(Andrew B. Smith)用生态学观点系统地分析了非洲游牧业从起源到现在的发展历程。他的著作《非洲的游牧业:起源与发展的生态学》(*Pastoralism in Africa: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Ecology*)对游牧业的各种定居类型、放牧类型、活动规律都描述得非常详细,向人们展示了非洲游牧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前,非洲研究已进行几十年,一大批专家进行了地形、植被、牲畜和游牧方式的研究,代表人物是笛森-哈德逊(Dyson-Hudson)和戈蒂埃(Gautier)。哈德逊的研究集中于喀麦隆和乌干达,重点研究游牧的生态适应策略,戈蒂埃则自1960年代以来集中研究马里和北非的游牧业。还有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富尔贝人(Fulbe)的游牧业,探讨此地的游牧者与农业者的关系,以及游牧人对现代社会压力所作出的反应。这批学者发表的文集的题目是《压力下的游牧者——西非的变化对富尔贝人社会的影响》(*Pastoralists Under Pressure? Fulbe Societies Confronting Change in West Africa*),他们的成果为非洲游牧业研究作出了贡献。

欧亚草原西部的研究也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个案研究达到

了非常深的程度。底哈尔(Gudrun Dahl)和黑高特(Anders Hjort)的著作《畜群管理 游牧畜群的增长与家庭经济》(*Having Herds: Pastoral Herd Growth and Household Economy*)发表于1976年。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畜群增长的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重点分析了畜群结构与灾害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为游牧经济和游牧生态的细致分析开辟了道路。中东地区游牧生态的另一项突破在于和考古相结合,历史研究的成果也好于其他地区,因史料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当然,还有许多关于游牧业和游牧生态的研究论文和书籍,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关于蒙古草原

尽管西方学术界对中东和非洲草原游牧业有很好的研究,但是对蒙古草原的关注并不很多,当然一些早期的开创性成果仍离不开蒙古草原的农牧生态问题。

20世纪初埃·亨廷顿(E. Huntington)对北方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化下对欧亚农业文明区的影响的分析非常著名,其著作《亚洲的波动》(*The Pulse of Asia*) ,此后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他系统地论述了灾害、雨量对游牧民的刺激,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对中国或其他文明古国的冲击。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在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对农牧关系和农牧斗争进行了论述。由于是初步的工作,他的研究特点在规模宏大的基础上展开。拉铁摩尔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利用地理特点对蒙古社会作研究,并且利用商业的关系,揭示游牧业对农业的依赖。他的早期成果主要集中于《边疆史研究系列——1928~58年期间的论文集》(*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拉铁摩尔的另一本书《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最近由北京大学的唐晓峰先生译出。与这两位专家相比,前苏联的一批专家倒是率先在更细致的水平上进行研究。制度史的研究首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他对草

原生态与蒙古早期社会游牧单位的研究至今无法超越。另外是温斯坦(Sevyan Vainshtein),他以人类学方法对图瓦——一个到清末仍为外蒙古一部分并直接受中国管辖的地区——进行了调查,详细地描述了雨量、草原质量、农业与游牧业形态,他的著作的英文译本直到1980年才出版,即《南西伯利亚的游牧民:图瓦的游牧经济》(*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西方学术界在1960年代大兴生态人类学方法之后,温斯坦的工作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美国的蒙古学者克瑞达(Lawrence Krader)几乎最早使用了现代生态学原理研究蒙古社会。他的研究涉及到鄂尔多斯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等,集中于蒙古家庭社会史方面。1963年,他出版题为《蒙古—突厥游牧民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 - Turkic pastoral nomads.*)的著作,有许多涉及到生态与社会的内容。198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生态学原理分析蒙古社会,但不以此为主题,如布赦和乌德嘎(Ole Bruun and Ole Odgaard)等人对外蒙古的研究。大卫·西内兹(David Sneath)写了《内蒙古的变化:蒙古游牧社会与中国国家权力》(*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一书,分析了内蒙古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关系,涉及到游牧业、农业的内容并不很多。帕斯特克(Burton Pasternak)与沙里夫(Janet W. Salaff)对这方面涉及较多,其著作是《牧牛者与种植者:内蒙古的人》(*Cowboys and Cultivators: The Chinese of Inner Mongolia*)。此书以呼伦贝尔地区为例,分析汉人在1949年以后的农业渗透,以及汉蒙融合的生态与社会过程。他们对比了汉人的农业与游牧业,努力寻求汉人农业技术在生态条件变化下的变异,探讨农业先锋者(frontier)在游牧区所经历的变化。他们似乎在通过1949年以后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些农业者的行为,寻求与老一辈学者成果特别是拉铁摩尔的命题进行学术对接。

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许是最多的,许多人的工作也像本书

一样,建立在满铁和日占时期的调查资料基础上,甚至许多研究就是在满铁时代进行的。后藤十三雄的《蒙古游牧社会》就是这样一本书,本书运用了许多满铁资料,也运用了许多他本人在中部内蒙古地区的观察,对蒙古游牧民的活动规律、畜群状况和草原生态都作了一定描述。农业方面比较好的成果是山田武一和关谷阳一的《蒙疆农业经济论》一书。此书以1940年代中部内蒙古地区的农业技术作为研究重点,除了自然环境、土壤和农作物结构外,还重点介绍了各地耕作制度、技术程序、地租状况和其他农业经营方面的事务。今堀城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历史与革命前夜的现实》是一本关于包头、张家口、萨拉齐和托克托一带农村的调查研究,他的主旨并不在于研究农牧交错带社会本身,而在于寻找中国封建社会本体的一些结构性特质。他的研究和调查突破了满铁资料一般模式即简单描述外部事务的限制,而是通过一些家族史资料、水利史资料和碑刻,进一步揭示了农牧交错地区社会内部的一些动态结构。日本学者的研究还有一些论文。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天野元之助也曾对这一地区作过实态性研究。他写的《察、绥农业经济全貌》一文,对这一地区的水利、技术和地租制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另外,《满铁调查月报》上发表了许多关于蒙疆土地开垦和土地制度方面的学术成果,其中安斋库治的《清末绥远的开垦》一文,到现代一直是研究近代蒙古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1949年以后,有许多日本学者继续努力对蒙古地区的社会制度进行研究,涉及到农业方面的是田山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这本书以制度为核心探讨了清代以来农牧交错地带的各种地租形态。日本新一代的学者中也有利用生态学原理分析中国游牧业的研究专著出现,如村西(Chosei Chichinohe)主编的《中国的游牧业:对游牧干旱区的年度联合调查》(*The Nomadism in China: Joint Field Research by All the Year Round Survey on the Pastoral in Arid Region*)。这是一部关于现代中国北部草原游牧社会研究的论文集。此外,澳洲的学者约翰·W·郎沃斯和格里格·J·威廉目森所著的

《中国的牧区》一书,也有许多篇幅介绍了内蒙古的畜牧业和草原状况,这本书现在仍为许多草原工作者所称道。

与日本学者和俄国学者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蒙古游牧社会的关注起步较晚。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著作可能就是贺扬灵先生的《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本书主要介绍了绥远、察哈尔地区的农业状态、土地放垦以及灌溉社会的制度,并简略地介绍了这两个地区蒙古游牧民的生活变化。建国初,有两份民族调查资料对蒙古人的草原生态和社会习惯做了很好的描述。一本是1956~1958年间政府组织的有关阿拉善局部地区的社会调查,成果一直到1986年才出版,这就是《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这本书介绍了阿拉善地区的游牧习惯、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另一本书是在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带领下作出的。1950年,他带领一个被称为燕京、清华、北大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的青年人群体在呼伦贝尔草原做调查,调查报告一直到1997年才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这本书是关于巴尔虎蒙古族和鄂伦春族和索伦族的生存状况的描述,其中包括游牧人口和畜群,蒙古族的家族制度以及基层组织,还有旅蒙商的资料,都非常有益。

草原工作者和畜牧工作者在1980年以前也作了非常好的调查工作。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对蒙古草原所作的工作,主要体现在1980年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一书中。本书的调查是在1960年代,不但对各地区的草原生态和主要草种做了描述,对当时的普遍流行的定居游牧技术体系也做了介绍。另一本书是畜牧方面的,这就是中科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与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合编的《内蒙古畜牧业》(科学出版社,1977),这本书重点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内蒙古各地的地形、草原游牧业和家养畜牧业的各种类型,同时介绍了各种牲畜的饲养生态。就个人研究而言,地理学界的前辈赵松乔所著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的初步研究》(科

学出版社,1958)是关于当时农牧业形态研究的力作。此书不但介绍了各种游牧类型,还进行了一些以乡村为基础的个案研究。1980年以后,国内一些单位陆续重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所的一些学者也作了许多有益的调查工作,但涉及到传统游牧业的部分较少。所以,以史料作基础,对传统的草原生态、游牧业和农业形态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仍是有必要的。

关于资料

本书的主要材料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日本人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最有价值的是许多实态调查资料。当时的调查目的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服务于当时日本当局的军事殖民统治。其他材料也有很多,一部分来源于档案材料,特别是1950年代的档案。满铁资料所调查的区域主要在东部内蒙古地区,对蒙古人的游牧业、汉人和蒙古人的农业,都作了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尽管材料众多,但质量有好有坏。关于游牧业方面,有一些调查资料的深度超过了现代许多学术调查的水平。但满铁资料作为一种外国人的调查,与华北和其他地区的调查一样,往往失之于外部物理形态的描述。满铁的任务是搞清具体的社会形态,但外国人往往不知道一些制度和土地关系内涵中的人情和乡村社会关系。土地数字或其他数字往往像汉文文献一样失实,这些调查人员毕竟没有亲自去丈量,但这些数字即使现在可能也搞不清。所以,本书对满铁资料的利用还是更关注游牧和生产关系实态描述的内容。

游牧形态调查最为详细的资料来自呼伦贝尔地区。伪满洲国的“兴安局”关于游牧习惯的调查成果,体现在《兴安北省草原和放牧习惯的调查报告》(1939)中。这次调查的时间是从1938年到1939年,区域为当时的西新巴虎旗、东新巴尔旗、陈巴尔虎旗和索伦旗,即现今牧业四旗。不但调查了当时的人口数、牲畜头数,牲

畜结构,还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游牧规律,包括牲畜每天的移动距离,各季放牧所经过的地点,各驻牧点水源状况、滞留的日数等状况,还有放牧特点和打草地分布的资料。最珍贵的是一批游牧图,这是几乎目前国内仅有的传统时代的游牧路线图。这本资料对研究内蒙古游牧业形态的价值极大。另一本是满铁铁道总局所主持调查后形成的《呼伦贝尔畜产事情》(1937)。这本资料除了对牲畜头数有所统计外,还有各阶层拥有的牲畜数量的记录和个体游牧家庭拥有牲畜的状况记录,并对牛、羊和马等各种牲畜体质特点作了介绍。对游牧生态研究特别有用的是,这本资料对冬夏营地的地形分布和牲畜数量的季节分布有示意图描述。第三本资料是关于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的调查,由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写,题目是《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1943)。除了草原和草原类型的介绍以外,它还特别介绍了放牧与冬夏营地的草原退化问题。这本资料与关于中部内蒙古的几本草原生态调查报告,几乎构成了中国最早的草原生态调查资料。这批资料非常宝贵,已经引起了有关地方部门的重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其中的一部分。

在东蒙南部的农牧交错地带,满铁的调查资料更多。有旗县级别的调查,也有乡村级别的调查。满铁调查部 1939 年出版的《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一书,对札鲁特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游牧状况、畜产数量和草原状态都作了一定介绍。这本资料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农牧结合型态的描述,特别是对以游牧为主、以农业为副生产形态的描述。《东部蒙古志》是一本出版较早的(明治四十一年 1908)对整个东蒙南部的调查资料,与后期资料相比,这套志书的内容以简单描述为主,主要描述道路两旁的村庄、农田与草原的景观。满铁庶务部 1929 年前后出版的《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书》更为详实,此书不但对村庄和农牧业景观作了描述,对商业网络的描述也很详细。另有一部大部头的关于地租制度的调查,即《锦热蒙地调查报告》(“地籍整理局”,

1937年)。这份资料共分3卷,收集了大量的清代契约,并结合这一带的实地调查,详细地介绍了东蒙南部各种地租制度。许多地区的调查回溯到200多年以前。所以,用这份资料也可以研究清代土地制度。对蒙地的土地调查另有很多,渗透到各地区、各专业。《一般民地》出版于1915年,不但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清代放荒时的各种条例和制度,而且记载了此制度在一些地区的表现。

对本书的写作价值更大的是几部关于乡村个案的实态调查资料。1941年出版的“兴安局”有关人员1939年对阿鲁科尔沁旗巴拉都塔恰村的调查,报告书名为《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这是个主牧副农的村庄。这本调查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村的成村过程,以及各种土地权益、人口、家族和阶级等。对外来人口的流动和各样籍青劳动者,有许多特别的描述,本书以此分析东蒙的劳动力流动状态。关于籍青,《满铁调查月报》还有一篇特别的调查报告,这就是山本纯遇的《蒙地籍青的一例:兴安南省科尔沁左翼后旗腰四不奎》。这个村庄是个主农副牧的村庄。还有对札赉特旗茂利图屯的调查,资料集中在《兴安西省札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兴安局”,1939年)一书中。对科尔沁左翼中旗郎农窝堡的调查,资料集中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兴安南省:实态调查报告书》(“兴安局”,1939年)一书中。对奈曼旗好来屯的调查,资料集中在两本书,一本是“满洲民族协会”的《主农从牧社会与“蒙古部落农业性格”》(1944年),另一本是“兴安局”的《兴安西省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统计篇》(1939年)。后一本后附有图表,其中之一是“农家略历表”,讲述了各个农家来蒙地开发的世代与经历,对了解个体家庭的迁移史非常有利。

中蒙地区的满铁调查资料是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区内进行的。一般都是由满铁的日本专家亲自主持,而东蒙除了满铁以外,“满洲国”机构也在进行调查。由于缺乏当地“政府”的参与,中蒙的资料不够丰富,社会调查资料相对贫乏,但却有几份质量很高的草原调查。其中一份是1940年出版的《蒙疆牧野调查报告》,另

一份是 1943 年出版的同名的《蒙疆牧野调查报告》。关于放牧和畜产,满铁调查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1937)一书和《北支那农业调查资料》(1937)一书中。这两本书集合了许多其他零散的满铁调查资料而成。“兴亚院”也做了关于游牧业的专门调查,资料形成于《蒙疆牧业状况调查》(1941)一书中。这部书描述中蒙各地的牧业状况,是以观察记录为主的描述,远没有达到“兴安局”对呼伦贝尔游牧习惯调查的水平。“东亚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内蒙古的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的一般调查之一部》(1941)描述了中蒙南部地区农牧交错带的农牧业状况。

还有许多资料有助于理解传统时代内蒙古地区游牧业与农业形态。特别是旧方志和笔记小说,但古籍中的材料毕竟很少。建国后编的新方志,尤其是各盟的畜牧业志,有许多有意义的记录和描述,但仍不如档案的内容丰富。就档案来说,清末的垦务档案非常丰富,现在的内蒙古档案已经将一大部分中蒙一带的垦务档案编辑成《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一书。这是一部大型的资料书,内蒙古档案馆的有关人员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至于新中国档案,1950 年代的档案非常有价值,当时搞群众运动和调查研究,尽管有许多报告和调查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但仍将游牧业的基本形态描述出来了。由于传统游牧业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 1980 年代以前,许多档案资料都有传统游牧业的影子。各盟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也有一些关于传统农牧业和商业的资料。除此之外,在本书的研究中,作者本人也进行了许多实地的调查访问,尽管现代的内蒙牧业已经发生了改变,许多老人对过去仍有清晰的回忆。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 9 章,基本上集中论述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游牧生态,以及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第

一章对游牧生态的历史趋势和近代一般状况进行概述,先从草原的类型、人口、牲畜的拥有和放牧制度去描述近代游牧生态的一般状况,然后再论述历史上游牧范围的历史趋势和变化。与农业区的生态不同,游牧生态与移动有关,而移动是有历史变化的,所以,本书在这里对历史时期的游牧移动做一些介绍。第二章中论述传统时代的草原生态,这是草原史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草原史志有一些关于草原产量的记载,但确切的草原植被演替和载畜量情况,几乎难以进行50年以上的研究,现代定点演替的观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本书以中蒙地区满铁时代的草原生态调查为基础,将当时的草原状态与1990年左右的草原调查作对比,对内蒙中部和呼伦贝尔草原的植被演替和草原生态的变迁作大致的探索。第三章重点分析游牧生态基本状态。对总体上的游牧生态变化,游牧生态中人口、畜群、放牧技术、放垦引起的变化作了总体上的论述,并对游牧圈的大小、饮水点分布、季节营地设置及雨量、灾害和草原的关系都进行了探讨。个案分析以内蒙中部、呼伦贝尔的冬夏营地为关注点,仔细分析游牧过程中牲畜与营地、积雪、水源、草原植被与放牧的关系。1949年以后,内蒙古牧区兴起了定居游牧,本章也对定居游牧做出分析,并特就定居游牧所形成的景观与权力格局变化做一定的探索。

第二部分的重点是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第四章论述畜群本身的经济特点及其与人的关系,包括阶级关系和其他关系。在蒙古社会里,草原是公有的,阶级划分的标志不是草场而是畜群。一个人拥有了更多的畜群,就具备了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传统蒙古社会的家庭与畜群有联系,牲畜聘礼、分家时的牲畜都与游牧业畜群自身的发展有关。聘礼中的牲畜在双方的部族间交流,外婚制也引起畜群的基因交流。另外,畜群本身也与蒙古社会的基本游牧群体的组合有关。第五章论述灾害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畜群在雪灾下的运动有一定的特点,防灾就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保护畜群。1949年以前基本上没有资料以供分析,本章以1949

年以后的雪灾资料为依据,探讨蒙古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灾害中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在保畜中,中国共产党启动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与蒙古社会的基层政权建设相协同。

第三部分论述农业渗透之后的变化。受汉移民的影响,蒙古人的农牧业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几千年来几乎一直存在着,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但探讨近代有益于说明这一古老的问题。第六章从定居形态与农牧业的关系入手论述农牧业的变化。在半农半牧区,由于草场的减少和农业对定期劳动投入的要求,游牧业的移动次数也减少了,定居逐步加强。与此同时,游牧业本身也逐步走向集约化,实施了打草、建圈等技术措施。蒙古族由于牧地的减少而逐步实现了农业,在实现农业的同时,畜牧业也减少了移动。无论从农业还是畜牧业方面看,蒙古人都在逐步地汉化。他们不但采用了精耕细作,还采用了舍饲和干草饲料。在生产、生活形态上逐步与汉人趋同。内蒙古的蒙人采取的是一种东亚特色的半农半牧形态,与蒙古族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所采用的半农半牧形态不同。从总体上看,在地理上与那种文化趋近,就受那种文化的影响。第七章从汉人社会的北扩和社会结构的复制来研究农牧交错带生态和社会变迁问题。首先对汉农业的基本文化特色——精耕细作的复制扩展进行了探讨,这是一种农业种植制度和土壤制度同步传递的过程。在这种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因各地的生态条件的不同有一些技术的微调,总体上仍呈现出一种复制特征。在技术复制的同时,内地社会的结构几乎同时地复制到蒙地,在农业扩展加强的同时,社会结构也与汉人社会趋同。尽管实行了蒙汉分治,两种行政区相互嵌合,但南部蒙地的基本社会结构与汉人基本上相同。在社会制度的复制过程中,一些内地的生产关系类型如榜青制度,在蒙地出现了放大,这种制度在内地由于人口压力和土地紧张而不明显。农业扩展与蒙古社会的冲突是在边界地区,以前的资料较少,1953年的乌拉特前旗及其周边地区有比较详实的关于农牧纠纷的事件记录。研究结果表明,农牧

纠纷往往是汉族以其牲畜北扩影响牧民放牧,先以牲畜为核心发生冲突。在解决冲突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以边界为核心的生态政治建设问题。第八章分析了蒙古土地制度。主要是清代农牧交错带的土地制度。就一般蒙地而言,存在着从蒙旗到汉人的多级土地占有,汉人通过永佃获得使用权,随着产量的增长和土地资源的减少,汉人使用权在利益分成中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清代的许多土地纠纷来自于汉人永佃权与蒙古人占有权之间的矛盾。在水利区,水利所产生的增产效益更大,水权的作用明显。河套地区形成了地商阶层,他们在蒙古人和汉人之间成为一种经营地主,由于资本的扩张,他们长期控制了河套社会。到后期,清政府介入河套水利,社会结构才又发生变化。第九章描述与农业渗透过程同步的人、物流的渗透过程。农业过程中形成人流,流动的人群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的扩张式复制,籍青制度就与这种人流活动有关,商业过程形成物流,当农业区向北扩展时,拨子商的前沿基地也向北移动。在清中叶以后,蒙地向汉人的商品开放,长期以来,商人通过不平等交换直接剥夺着游牧区的牲畜,使近代蒙古的贫困程度加强。

第一章 总体概况

游牧生态是游牧中人、畜群与草原的关系。了解人口、畜群与草原本身的状况,是研究游牧生态的前提。长期以来,关于游牧人口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尽管有许多人研究历史上的牲畜数字,但很难用于生态环境史分析。目前可以运用的人口和牲畜资料,基本上是近现代的数据。这里所介绍的不单是游牧人口数据,而是与人地关系特别是放牧规模与草地负载量有关的一些基本数据和基本状态,正是这些内容反映了人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

一、游牧中的人地关系

内蒙古草原东部的年降雨量较多,大部分地区为300~400毫米;在中部,只有南部少数的地区在300毫米左右,北部大部分地区在100~150毫米;西部的阿拉善地区大多不足100毫米。雨量变化引起游牧业类型的变化。由于不同条件下草原的生产力不同,目前国内草场划分标准主要依草产量和水源而定。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东西部草场资源差异甚大,从东向西都有下降的趋势。一等草原和一、二级草场也主要分布于东部的山地林缘草甸和森林草原地带,西部许多荒漠带草场的产草量在每亩100斤以下。内蒙古东部产草量较高的草场10~15亩草场就可以养一只羊(绵羊单位),西部地区通常需要20~30亩才能养一只羊。东部草场的生产力的波动性小,一般丰歉年不超过1倍,而西部高达4

倍。动物的分布和放牧形态长期以来与雨量分布相关,罗森伯格(Ruthenberg)的研究表明,50毫米以下降雨量的地区应是完全游牧,土地的利用形式是“偶尔利用”,牲畜种类为骆驼;50~200毫米时仍为游牧,游牧形式为长期迁移,牲畜种类仍为骆驼;到200~400毫米,有三种土地利用的方式,分别是游牧、半游牧和农业,牲畜种类可以再加上牛、山羊和绵羊。^①在内蒙古,不但雨量的变化与牲畜的分布相吻合,牧草的种类也与之相适应。草质从东到西趋于粗劣,营养成分也随之发生变化,牧草中的含碳无氮物质降低,粗蛋白和灰分增高。从牲畜饲养来看,东部草原的草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适合发展乳牛和肉牛的生产;中部草原的牧草粗蛋白含量高,适合发展羊和其他牲畜;西部荒漠草场,多为小灌木和半灌木,富含灰分,适合发展骆驼和山羊。^②

(一) 人口、牲畜与家庭

游牧人口的多少直接由牲畜多少所决定,而牲畜的多少直接由草原负载量决定。放垦以前,蒙古草原禁止汉人迁入,只在河套地区有一定的汉人迁入,其他地区主要是蒙族人口。由于清朝政府推崇喇嘛教,出家者日众,蒙族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在嘉庆四年,西北蒙古十八旗的喇嘛人口有2,003人,占男子人口的比例为24.5%。在喀尔喀四汗部,1918年的喇嘛人口达105,557人,占男子人口的44.6%。^③以西新巴旗为例,民国时期喇嘛人口达1,515人,占这个旗总人口的25.1%。^④从清初到民国,蒙人人口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察哈尔八旗的清初人口有46,500

^① G. W. 柯克斯、M. D. 阿特金斯:《农业生态学》,王在德等译,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84页。

^② 《内蒙古农业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157页。

^③ 山田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7页。

^④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1943),第416页。